

PRO DOMO

YONA FRIED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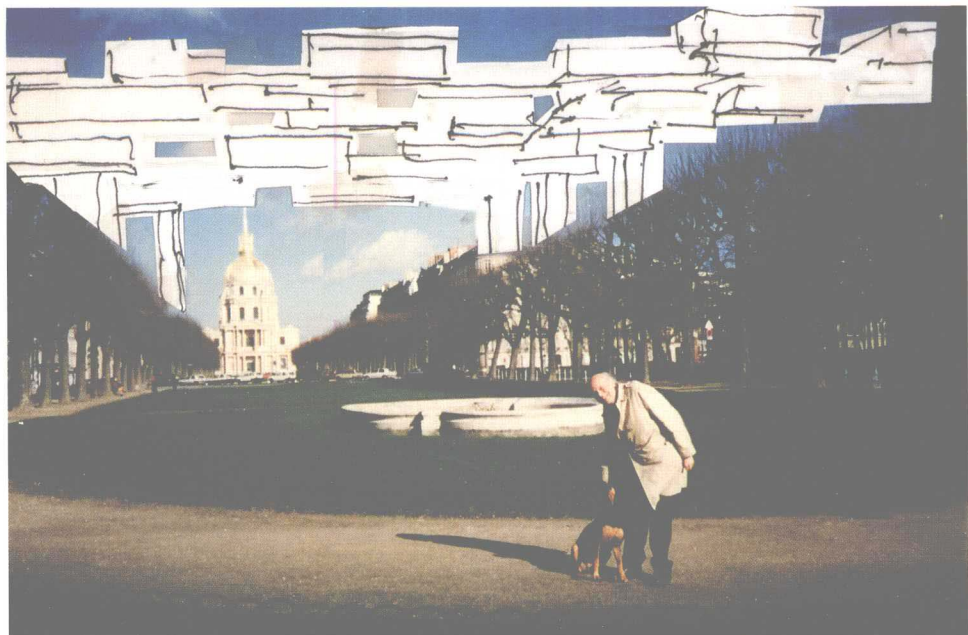
为家园辩护-尤纳·弗莱德曼

译者: 秦屹 龚彦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公元前57年,古罗马第一雄辩家西赛罗从流放地回到家乡,发现他的宅第已经被对手格洛狄乌斯的煽动策划所拆毁,并在原址建造了庄严的神庙。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西赛罗发表了一篇雄辩演说“Pro Domo Sua”(为家园辩护),最终说服了长老院,拆除神庙,恢复他原先的家园。

两千年后,同样有过流放命运的33岁匈牙利人,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丢掉了他在以色列技术大学的教师工作。此前他刚刚参加完1956年的第十届国际现代建筑大会,并在会上首次提出了“移动建筑”需要一个“可变化的社会”理念。这个理念完全来源于居住者的意图的自由表达,强调城市存在的真实原因是一种满足人们日益频繁的休闲活动的的能力。建筑师必须允许人们的自发性建造,同时使这种建造尽可能的“可变”。半个多世纪来,弗莱德曼始终坚持的就是:建筑师与其固执己见,沉迷于个人感观的满足,不如服务于使用者并提供技术和组织上便利。建筑应该提供一种“可能性”。这种非精英化的动机引领着弗莱德曼的作品形成以个人自由建造为基础的灵动形式。

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或许只有将那些属于“个人”的“家园”归还给使用者,由使用者自主决定随机的居住和生活方式。城市,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接近美好,“接近天空”。



我和Bakis在荣军院 (Les Invalides) 前

致读者

这其实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零散思想片段的合集。它们既不完整连贯，也不是我的“遗嘱”，我甚至没有选用那些被称作本人“作品”的关键文章，因为它们已被广泛出版了。

这些片段写就于我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其中有些已在不同场合发表。没有特别强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仅以我与它们的情感牵挂来做选择。我觉得它们是我建筑生涯中的里程碑，但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

我请读者谅解我的自私态度，但我希望，其中的某些观点会使您有兴趣一读。

观察世界有两种基本方法：“分析法”（analytical）——假设世界（或任何事物）是由或多或少的元素，规则地积累而成的；“整体法”（holistic）——把世界（或任何存在物）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分析法”是人类特有的，而“整体法”则是大多数高级脊椎动物对世界的解读方式。

“建筑”，作为人类的规划行为，是这两种方法的混合体。就技术结构而言，是“分析”的；而对建造物的评价（情感或功能角度）则是“整体”的。两种方法虽然都关系着同一事物，但又难以在思考时两全。比如，建筑文本是由特殊符号构成的（这些符号由简单的标记合并而成）。但是，即便通过这些累加起来的符号，我们依旧无法解释其“意义”。因此，文本的写作——应该——建立在分析法上，而——对它的解读却是整体的。

作为一门行业，建筑是分析的。是对场地的建设和对现有材料的利用。然而，对观众（或“使用者”）而言，建筑又是整体的，是一件艺术作品。

很大程度上，艺术品是由观众创造的，艺术家仅仅触发了观众暗存的情感而已。同样，建筑师并未“创造”（create）一个城市，他们只是在其中添加了一些构筑物。是居住者“缔造”（invent）了城市。一个无人居住的城市，即便是新的，也仅仅是一座“废墟”。

原始建造时期，“创造者”与“观众”是同一个人，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在千年之前就已将这两个角色分开了。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又能让“创造者”与“观众”再次统一，再续前缘，方法就是让“使用者”（user）和居住者成为创造者和目标的实现者。

“使用者”（user）并不需要具备与建造师或者规划师相当的技术水平，他所需要的是一种实施“试错”（trial and error）技术的可能。对这种技术的开发就是我所从事所有项目的目的。

达到这个目标很难。首先需要找到现有元素，然后评估不同合并形式的可能性，最后，特别重要的就是，用视觉化的方式来呈现可能的结果。至于最终的决策权，那就交给既是艺术家又是观众（artist-spectator）的创造者们了。

试错（trial and error）意味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意味着清规戒律越少越好，越不精确越好。事实上，这些就是“诗”的特性。



Yona Friedman Pro Domo 为家园辩护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目录

我的自述 9
自我访谈 26
工作自评 46
脚注 54

第一章
理念的诞生

可变城镇规划的十项原则 63
可变城镇规划的十项原则的补充 70
软化城市 70
洲际城市 73
第三个千年的城市 95
撞击世贸中心事件的一些反思 107

第二章
城市

关于理论模型 111
关于诠释 116
城市的诠释 124

第三章
普遍理论

住宅书写器 (the Flatwriter):
电脑的选择 127
关于住宅书写器 135
ISEA 2000 137

第四章
举措

第四产业 145
对于贫穷世界的讨论 168
两种道路 178
解决城市生存问题的策略 182
城市农业 188
绿色建筑 190

第五章
生存

不规则结构和其在建筑中的应用 201
不规则结构 210

第六章
不规则结构

巴黎奥林匹克 249
威尼斯水域 256
上海黄浦江中心 258
威尼斯双年展绘制的空中城市 264
21世纪博物馆 266
一个根据不同展览变化的美术馆 270
一份关于纽约的建议 274
特拉维夫和平之桥 278
Les Halles的“伞” 280
柏林 284
布鲁塞尔2000年艺术展 290
米兰体育场上的空中城市
(Ville spatiale) 292
突尼斯、麦地那之间的新路线 294
蒙特卡洛 (Monte-Carlo) 296
巴黎通道上空的发展 300
火车站 304
南西 (Nancy) 306
巴黎空间 308

第七章
新旧方案

理念的诞生

我的自述

巴黎，2006

写在西赛罗 (Cicero) 在长老院前为自己家园辩护 (Pro Domo Sua) 之后

小学时，我就发现原来孤零零的房子并不存在。房子的终点不是屋中地板的外沿，而是继续伸向街道、花园，然后，到达街道对面。跨越街道后的房子继续进入并穿越它面前的一切，如此反复，延伸，再延伸……想象一栋房子就是想象整个世界。

每个人都会想象自己的房子。因此，每个人都在想象自己的世界。每座由居住者想象出来的房子都会不同，于是每个人想象出来的世界也不同。一座房子或一个世界因此没有必要与别人想象中的一样。

同时，想象中的房子与世界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真实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独特个体组成的世界里，他们是那些普通又现实的“邻居”。所以，“邻居”以及他们想象中的房子与世界同样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环境”。

成为年青建筑师后的我，开始探询一条实现居住者想象中房子的道路，它们的形状或规划都应该与他人想象中的截然不同。怎样才能依据居住者每天不同的想法和喜好来调整并满足个体对建筑的需求呢？于是，我开始探寻一门“技术”。

第一个技术想法来自于非几何的“变形虫式” (amoebic) 形态，一种完全不规则但有着任意变形调整能力的规划。40年代，随着“预制装配件”技术的兴起，“板材” (panels) 开始普及。我想了一种由铰链接起来的折板组，取名为“折叠屏风”。1945年，在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流放的日子里，我开始勾勒设想如何把这种“折叠屏风”运用到房屋规划中，同样，顺延这个逻辑，继续构思“街道对面的房子”。

很快，一个技术问题产生了：覆盖“折叠屏风”的“屋顶”与“天花板”。由于板材材料的固定技术以及“折叠屏风”的任意性，屋顶的外轮廓很难被规则化。因此，只能忽略每个具体部件的形状，而做一个形状、外形与“折叠屏风”构造完全不同的屋顶。它将用一种能够容纳“折叠屏风”的几何骨架来支撑。这样就可以实现建造居民自己想象的房屋了。

这个设想把我带回到30年代那些我孩童时代的梦想：“穿过街道的房子”、甚至“楼上的房子”……为什么不能构想一个各种独立房屋共同拥有的大框架，就象“穿过街道的房子”和“楼上的房子”那样呢？

1945年，在那些被流放的闲散时光里，我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想法。那时，与多数流放者一样，我的梦想就是去欧洲。受到报纸上有关急需战后重建的文章影响，我考虑将我的板材“预制配件系统”提供给当时代替大使馆的联合代表团，希望他们能对此产生兴趣，并把我带走，离开此地。

在绘制这种“理想建筑”的过程中，我开始面临诸如供水、供电等效用网络（utility network）问题。这让我想起1945年，去布加勒斯特之前的一个月。当时，我不得不在半废墟状态中的布达佩斯过冬。那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供暖、没有窗户，也没有多少食物。我开始意识到，物质化的城市并不是指房屋，而是效用网络以及街道。因此我决定先考虑这些配套设施服务，而不是建筑理念。

1946年，我终于通过非法移民手段结束了流放生涯，在以色列的一个集体农场住了半年。因为只有从那里我才能到海法（Haifa），去看看是否能在以色列的一所建筑学校——以色列技术大学（Technion）登记就学。

我的在框架结构中的“折叠屏风”（folding screen）方案虽然没能帮我离开布加勒斯特，但却使我获得进入以色列技术大学第三学年学习建筑的资格。由于“限制犹太学生数的立法”（the numerus clausus），我无法提供在布达佩斯综合技术学校（Polytechnic School of Budapest）学习的秘密记录，我只能用从布加勒斯特带来的草图证明自己前期专业的水平，而系主任Ratner教授给我开了绿灯。

在三年级学习期间，我先以自己的想法绘制学校的“项目”。然后，在老师的要求下，重新回到几何形和混凝土风格的建筑训练上继续学业。

我开始用一种更加符合当时社会条件的技术，来着手研究“个性化”住宅的其它意义。

但是，即使是那些“标准”的规划，也是可以变化的。我在其中引进了一种可移动的元素——“类家具”（quasi-furniture）。浴室中的固定设施将通过易弯曲的塑料软管与效用网络连接在一起，从而使它可以灵活地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厨房区域将出现另一种“类家具”；连卫生间里原来固定设施现在也可以在主排水管上自由旋转。这样一来，根据居住者的自主决定，“类家具”将把大框架分割成不同的房间。

四十年后，我将这种筒体住宅和撒哈拉舱等住宅的办法运用流浪者住宅的设想中。在我的记忆中，筒体住宅于1956年诞生，而“家具舱”（furniture-cabins）于1957年问世。1953年左右，我负责一项海法社会住宅计划，我试图在其中尝试我上述的方法。但是，没被部长批准，无奈中，我还是被迫去设计那些当时视为所谓的“创新”的传统住宅去了。

我并不是在写一部自传，我只是期望能呈现我建筑理念的发展历程。当时，严格的讲，我既是建筑师，又同时在以色列技术大学教书，直至1956年。我才以“半个调查员”的身份参加了在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建筑师大会（CIAM X）。那时我展示了一些草图，并跟一些“年轻人”探讨。我原以为杜布罗夫尼克之行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但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发现我可以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建筑世界》（《Bauwelt》）杂志的编辑，Gunther Kuhne，对我的观点很感兴趣，并在1957年出版了其中的部分。但是，那年，我被以色列技术大学开除了，因为我误了新学期的开学时间。而那次延误是由于苏伊士运河危机使得到达以色列的常规航班取消而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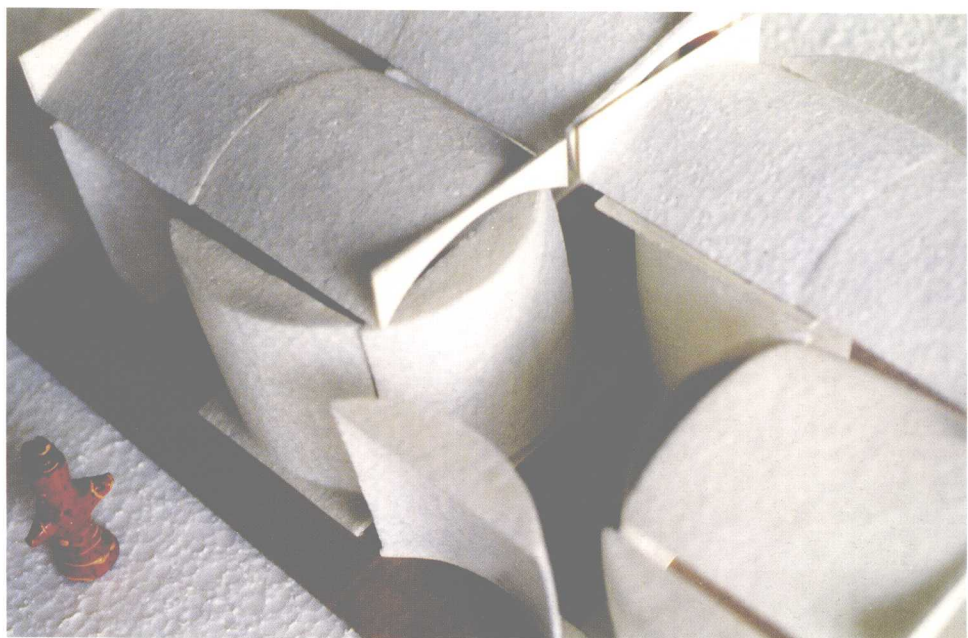
由于受到第十届国际建筑师大会经历的鼓舞，我决心到欧洲找寻—条实现我建筑规划理念的道路。1957年，我先后来到了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寻找资助。弗莱·奥托（Frei Otto*）—在当时一个与我—样默默无闻的年轻人，看了《建筑世界》的文章后给我写信。在荷兰，我希望得到Bakema的资助，但未成功。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当时正在寻找解决“移动”问题的Trap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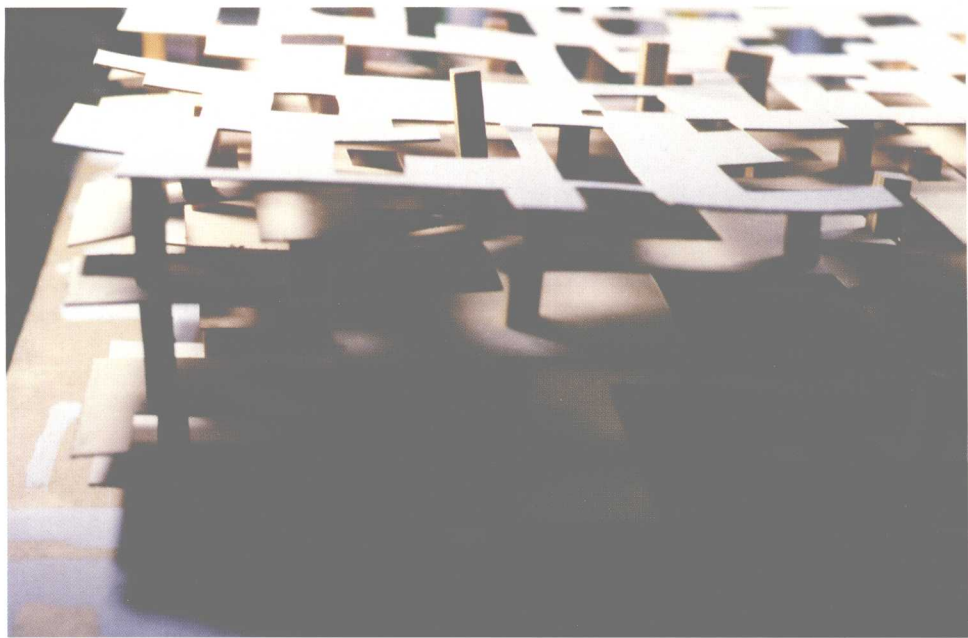
* 弗莱·奥托（Frei Otto），德国结构建筑家，其著名的帐篷式膜结构和钢索结构，可以说是开创了膜结构商业化的先河。

* 贝克玛（Jacob. B. Bakema）精通水力工程技术，的荷兰建筑师，十人小组成员（Team 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范登布鲁克（J. H. van den Broek）共同从事鹿特丹的重建。



曲面板材建造的房屋。同样的板材可以用作墙体材料和屋面板。(以色列, 1953年)





有四层楼板的“空中城市” (ville spatiale) 早期模型 (1959年)

表现空间—框架的内部构造的空中城市模型 (1960年左右)



离开阿姆斯特丹，我去巴黎见到在杜布罗夫尼克认识的Andre Sive，通过他我认识了简·普鲁威(Jean Prouve 1901—1984年)。普鲁威对我的“筒体住宅”概念很感兴趣并同意一起去实现计划。不幸的是，他的公司1957年破产了，于是我不得放弃这次冒险。放弃？不。我遇到了Jean Pierre Pecquet，通过他我得以实现筒体住宅并研发其它项目。对我来说，与Pecquet的合作很有必要，他与我不同，因为他是可以在法国工作的建筑师专业协会会员。在阿姆斯特丹，我还绘制了“布朗涅森林地区*” (City of Bios de Boulogne) 的草图，一个横跨森林的居住体系。

在杜布罗夫尼克提案里，我强调减少建筑对地面的依赖，从而让城市变得“可以移动”(mobile)。我所提出的两项技术，由间隔60米的楼梯塔支撑的“大跨度街区”和由架在“横梁”上的箱块组成的“筏型街区”，目的都是将建筑从地面解放出来。筒体住宅也是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我从社会角度重申自己的理念。在第十届国际建筑师大会上，我曾强调并解释：随着人们对休闲活动要求的提高以及对其投入时间的增长，需要满足人类这一需求的能力，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存在的真正理由。建筑师必须遵循这种来自大众的意愿，并同时尽可能地顺应这种意愿的可变性。“可变性”，从这层意义上讲，是一种“自然法则”。

我曾试图建立一种“可变性理论”，一番天真的实验与表达未果后，我现在必须承认：“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过程中的步骤。至于最后一步，从来就不存在”。

我的“可变性”理论代表一种在严格参照构架中的无止境过程。以动物为例，动物们在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中自由生存；与之相反，由于参照点的不断变化，人类的行为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相对于动物，虽然发明了意义，却剥夺了自己的自由。五十年后，我发展了这一假设。

到达巴黎后不久，终于，我得到了我所需的资助——来自于普鲁威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我的观点得到年轻建筑师Aujame, Pere-Lahaille, Pecquet和Emmerich的赞同，于是我设想与奥托，Kuhne, Gunschel, Trapman (德国)，荷兰的Shapiro (他在海法技术Technion工业大学就学的时候我正在那儿教书)，以及我在第十届国际建筑师大会遇到的

* Jean Prouve(1901—1984) 法国家具设计师

* 布朗涅森林地区 (Bios de Boulogne) 法国巴黎西南部的森林地区

Soltan (波兰) 一起成立一个小组。

通过书信往来，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1958年初我们在鹿特丹汇合，GEAM (移动建筑研究小组) 于同年成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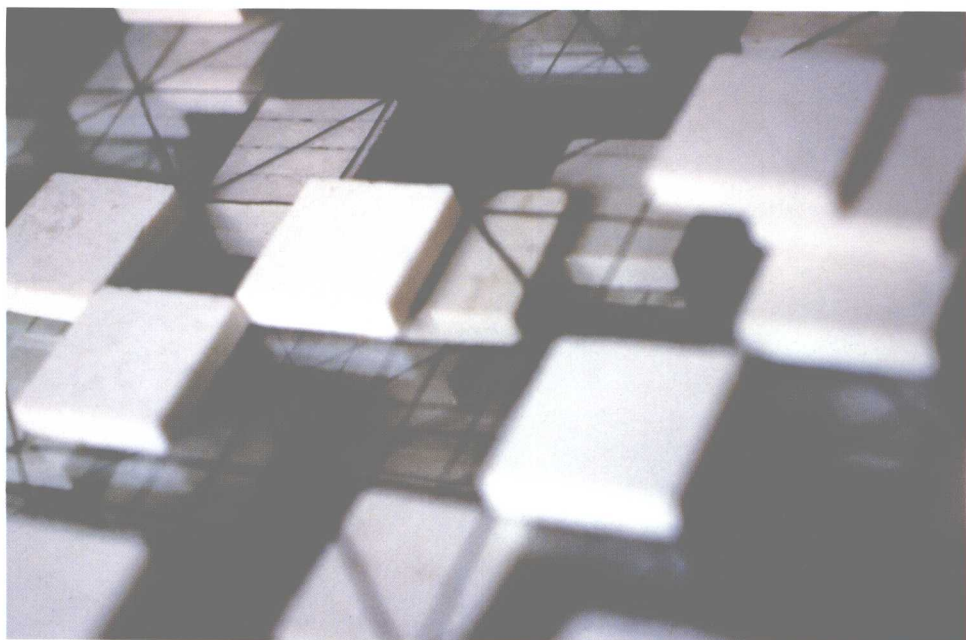
在一份叫做“移动建筑”(Mobile Architecture)的宣言中我陈述了我的观点。法文版由 Denise Charvein 校对，她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我把宣言寄给那些兴许会对此感兴趣的建筑家，到1958年底，已发行了300份。陆续收到的大量信息反馈让我在1958年底不得不完善这一宣言的内容，并增加了些图像，于1960至1961年间第一次再版，1963年第二次再版。1963年的版本里包括了我的“易理解系统”(Comprehensible Systems)理论，该理论同时发表在Pierre Naville主编的CNRS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业科学杂志上。

从1945年初试理论，到出现可能的形态，再到挖掘社会效应与其内在哲学的关联等，我为之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移动建筑”就此诞生了！在我的哲学表达中，我承认并接受人类行为和居住者的不可测性，对规划的幻想，以及每个性格无常个体的独特故事。我想在任何领域中，过程都是重要的。不存在一种来决定最终结果的“完全确定性”。

我对这种城市诠释将产生的结果也很感兴趣，如全球化交流的不可能性，机械化的沟通给交流带来的限制等，这些都体现在我1975年写的《可实现的乌托邦》(Utopies Réalisables)一书中。“城市机制”(Urban Mechanisms)是一次对居住者不可预知行为的分析尝试，也是我在美国系列讲座的总主题(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Ann Arbor大学、加洲大学等)，在我的《建筑科学》(《L'architecture scientifique》)(题目是出版商选订的)里有详细描述。1963年起，我发展了一种以“空间粒子”(Space Particles)的不定性行为为基础的物理学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

我觉得从1945年至今的工作一致性十分重要。1958年，我写到“普通人”(the average man*)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基于我对个体重要性的强调，我认为个体的不可预测性无法用一个浓缩词来描述。于是，我在联合国居住研讨会调查报告中写到孤立的房子不是房子，“屋顶”与“食物”是两个不可分开考虑的元素。

*由魁特奈特(A. Quetelet, 1796-1874)，19世纪最有影响的统计学家之一，于1835年提出。



玻璃—马赛克模型反映出复杂的内部空间

